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83

旧世界的相遇

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

[美] 杰里·H. 本特利 著

李大伟 陈冠堃 译 施诚 校

OLD WORLD ENCOUNTERS:
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



上海三联书店



旧世界的相遇

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

[美] 杰里·H. 本特利 著

李大伟 陈冠堃 译 施诚 校

OLD WORLD ENCOUNTERS:
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美]本特利
著；李大伟，陈冠埜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12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5436-6

I. ①旧… II. ①本…②李…③陈… III. ①文化交流—文
化史—研究—世界 IV. ①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0067 号

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之前的跨文化联系与交流

著 者 / [美]杰里·H. 本特利

译 者 / 李大伟 陈冠埜

校 订 / 施 诚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3.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436-6/K·358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中译本序言

刘新成

今年夏天的一个清晨，短信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打开手机一看，是卡罗尔女士从夏威夷发来的，告知她的先生，即本书作者杰里·本特利教授已于几个小时前与世长辞。虽然早有心理准备，虽然一个月前我还专程赴其寓所见了最后一面，但噩耗传来，我仍感到十分悲伤。他只有62岁，正处在全球史研究的高峰期，遽然离世，对世界历史学来说实在是一大损失。何况他还是朋友圈中公认的“谦谦君子”，温文尔雅，他的故去怎能不让人格外感到心痛。作为全球史的传播者，本特利教授在中国有许多朋友，今天，他的《旧世界的相遇》一书中文版问世，可视为我们这些中国朋友对他的一种缅怀。

本特利1949年出生，是家中长子，小时候生活在美国南部。美国南方浓厚的宗教氛围对他有深刻影响。他从小就经常跟随父母去教堂，中学时代即对奥古斯丁等古典作家产生兴趣，并常常为深奥的神学问题陷入沉思。

在田纳西大学读本科期间，受文艺复兴研究专家的影响，本特利深感理解人比理解文本更重要，于是阅读兴趣从宗教经典转向人物传记，在心灵深处打下人本主义思想的根基。1968—1969年，在美国反（越）战高潮中，他以一篇关于伊拉斯谟和平思想的评论享誉校园。

研究生阶段，本特利转入明尼苏达大学，主攻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于1974年和1976年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受到严格的历史技能训练，研习了法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多种欧洲语言，与此同时，他的自身认同也从

宗教信徒转向人文学者。

走出校门,本特利即到夏威夷大学任教,除授课外,还从事欧洲文艺复兴研究。1976—1987年,他在该领域先后发表8篇论文和两本专著。其中1983年出版的《人文主义者与圣经:文艺复兴时期的新约研究》一书,揭示了解读希腊文版《新约》对人文主义学术的推动作用;198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文艺复兴时期那不勒斯的政治与文化》一书则探讨了人文主义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力。本特利后来回忆说,较之思想史、制度史等传统热门领域,他更喜欢文化史,文化史熔信仰、价值、习俗与日常生活研究于一炉,以“生活意义的追问者”为研究对象,这非常符合他的学术旨趣,因为他本人人生目标就是成为这样一名“追问者”。

本特利的上述论著,曾被译为意大利文出版,由此可见其学术价值。但是就在文化史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之时,他却作出“学术转向”。为大学一年级学生讲授世界史的经历和夏威夷的多元文化特征,使他这个虽然成长于单一文化环境,但却十分敏感的年轻人从新奇、兴奋逐渐转入深沉的思索。他首先对局限于西方文明的研究取向进行了自我否定,进而提出一个前人鲜有涉及的问题:西方文明是一个孤立的文明吗?她真的那么纯粹?她难道不是在与其它文明的互动中演进?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求索,启发了本特利对世界历史的新认识。

本特利在讲授世界史时,依托夏威夷大学的强势学科——亚太史,尽量以一种相对平衡的、非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编写教案,对传统的世界史分期、分区方式进行大胆改革,努力打造一门新的世界史课程。1987年本特利以夏威夷大学历史系历史上第一位世界史专家的身份晋升为教授,这时他已经开设了多门世界史研究生课程,使该校成为美国首批设立世界史博士点的学校之一。同年,他因业绩突出获得校长颁发的“杰出教学奖”。

1982年美国“世界历史学会”成立,本特利是创建者之一,后来还担任常务理事。1990年会刊《世界历史杂志》创刊,本特利是创

刊者并一直担任主编,直至去世。鉴于本特利教授的“掌门人”地位,世界历史学会总部和《世界历史杂志》社均设在夏威夷大学。如今世界历史学会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组织,《世界历史杂志》也成为全球史领域最著名的两种杂志之一。伴随这一会一刊的发展,世界史学/全球史也进入空前繁荣的阶段,本特利教授逐渐成为国际知名的世界史学家。

本特利在世界史领域的不辍耕耘取得丰硕成果,其中产生重大学术影响的有:1997年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的论文“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史分期”;1996年提交美国历史学会的专题论文“20世纪学术史中的世界史”;1993年发表的专著《旧世界的相遇》;2005年参与主编的5卷本《博克夏世界史百科全书》,以及2011年独立主编的《牛津世界史手册》。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属与另一作者合编的世界史教材《传统文明及其相遇》,该教材自2000年初版以来,至2011年出了第五版,成为英语世界使用最广泛的世界史教材。本特利有两篇世界史论文分别被译为中文和德文,《传统文明及其相遇》一书也于200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书名为《新全球史》。

本特利的原创性学术成就在于从跨文化互动的角度对人类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为说明其价值,有必要回顾西方的世界史学史。

历史学的本质是主观建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固然由古代东方人提出,但西方古典史学也抱持同样的宗旨,关涉宏观叙事,尤其如此。西方古代中世纪的世界史学一方面受希伯来精神和基督教影响,把人类生活规定为具有客观归宿的活动,另一方面在古希腊理性传统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影响下,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一种前后相衔、因果相接的单向直线运动。“千年王国”是人类命运的最终归宿,个人和集体的救赎乃是抵达“上帝之城”的必由之路。启蒙运动以后,上帝主宰论被理性决定论所取代,但目的论、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变化,如康德所言,世界历史的目的仍是展现历史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历史进步的因子从上帝的

“选民”替换为潜在的理性之后，理性的开启程度便成为世界历史叙述的基本线索。在基佐将物质和精神的进步统称为“文明”之后，西方人从知识生产和武力扩张双重角度见证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理性进化论从而转化为西方优越论。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人花样翻新的“文明史”、“文明论”其实是在不断重复一个主题，即西方文明依靠其比较优势，促进世界其他地区文明化，带领他们走向全球文明。在这些描述中，西方民族国家是文明的标准，所以世界史的叙述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20世纪，世界巨变，两次世界大战、战后民族独立运动、后现代主义、全球化等等，无不彻底颠覆西方的理性神话，无不展示世界的多元一体性质。西方中心论遭到空前的质疑，目的论和单线进化论受到无情的解构。面临质疑和挑战，西方世界史学家曾作出理智的回应：汤因比指出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布罗代尔弱化民族国家的作用，指出由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组成的文化共同体才是世界历史舞台的主角；麦克尼尔认为，世界历史的核心内容是全球一体化过程。然而更多的西方史学家在质疑和挑战面前采取回避态度，认为所有宏大叙事都含有空想色彩，不符合科学规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本特利站在前述几位史学大师的肩膀上，坦然面对对宏观史学的非难乃至鄙夷，以一个“生活意义追问者”的执著心态为创建新的世界历史体系而苦苦探索，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形成独特的叙述框架。他摒弃历史目的论，但同时承认世界历史存在于“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三大过程当中，体现为移民、物种交换、社会发展、商品流通、文化交流、帝国主义六大主题。他格外关注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人群之间的互动，既否定文明的“单纯性”从而动摇了西方中心论的根基，又弥补了西方世界史学一味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所造成的叙述盲点。本特利的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其影响巨大的教科书《传统文明及其相遇》中（参见拙文《新全球史》中文版序言），这样，本特利就不仅回答了宏观历史有无必要的问题，同时为世界历史如何撰写提供了样本。

本书《旧世界的相遇》是作者转向全球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比《传统文明及其相遇》一书早发表8年,可视为后者的“前奏”。本书以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互动为主题,而时间节点选在1492年以前。这一时间选择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传统世界史观认为,世界各地之间建立联系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事,而且整个过程以西方人为主导,因此从“相互关联”的角度审视世界史,只能以1492年为起点,而且必须仍然承认“西方中心”。而本书则揭示,人类自诞生以来,不同群体之间就存在不同程度的互动关系,而且不乏“世界性”,“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关联史”只是人类群体互动史的继续,“世界连为一体的历史”并非从1492年开启。

我与本特利教授相识于2004年初,当时我为修订吴于廑和齐世荣先生主编的《世界史》在美国访问交流。许多美国学者向我推荐了本特利教授的论文和教材。捧读之下,受益匪浅,于是从网上查到通讯地址贸然给他发了封电子邮件。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他的回复,并被邀请到夏威夷大学一晤。我从东部前往夏威夷,本特利恰好也从波士顿回返,同在旧金山转机,相约机场问讯处会面,初次见面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从此以后我们往来频繁。2004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举办“世界通史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本特利专门邀请了10位不同国家的全球史学家与会。会议期间,首师大成立“全球史研究中心”,本特利受聘为名誉主任,并担任该中心刊物《全球史评论》的学术顾问。从2006年起,本特利连续6年被首都师范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每年两次来校授课,并促成国际世界史学会2011年年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至2011年末,本特利教授先后到首师大教学、造访达16次之多,与该校师生结下深厚友谊,也为中国的全球史事业作出了贡献。据国外同仁介绍,本特利为全球史在意大利和德国的开展也曾不遗余力地奔波,难怪人们称他为“飞翔于世界各地的学者”。从《传统文明及其相遇》第二版开始,每次推出新版,本特利都送我一本,并在扉页写下相同的赠言,赠言的开头总是“以全球史的名义”。“以全球史的名义”,愿世界各地的全球史学者都在这一旗帜下,加强学术交流,推动世界历史学的发展。我想,这是对本特利教授的最好纪念。

前言

1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西半球的远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之一。1492年哥伦布航行之后,跨文化交流对世界各民族的经历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学者在研究长途贸易、技术传播、帝国和殖民活动、大规模移民、动植物和疾病传播以及跨文化传教活动的同时,都注意到了近代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但是,跨文化交流既非始于1492年,也非始于欧洲人。在早期人类生活中,跨文化交流就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普遍现象。本书主要考察近代以前跨文化交流的动力,强调不同文明状态下各民族交流的文化影响,认识和理解各民族在不同文明和传统下跨文化改宗、冲突和妥协的方式,尤其关注“跨文化改宗”这一历史现象(跨文化改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跨文化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交流,并有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彻底发生变化),最后在更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中展现世界文化的发展。

自古以来,文化就广泛传播,并且经常遭到强烈抵制,而“跨文化改宗”这一概念也饱受争议。实际上,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动因,只有外邦人^①才会改宗异域文化传统。贸易或政治结盟有时会引起人们对异域文化传统的关注,国家政治和军事支持也会推动文化传统传播。然而,即使得到了政治、社会或经济支持,如果缺少文化融合的过程,也只有外邦人才会支持异域文化传统传播。文化融合意味着相互妥协,即在一种新的文化结构中,不

2

① 外邦人指生活在异地的群体,故被当地社会称之为外邦人。——译注

仅要包涵当地固有的信仰、价值观念和风俗,而且还要融合传播至此的异域文化传统。可以说,文化融合对跨文化改宗和宗教、文化传统传播带来了深刻影响,明确了交流界限,调和了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

《旧世界的相遇》一书的出版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帮助、建议和支持。夏威夷大学艺术与人文中心的学院奖学金对本书的写作和修改提供了极大资助。这里还要专门感谢各个领域的同事,他们的建议和批评使本书更加完善,其中包括罗杰·T. 埃姆斯(Roger T. Ames)、罗杰·B. 贝克(Roger B. Beck)、戴维·W. 夏贝尔(David W. Chappell)、阿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菲利普·D. 科廷(Philip D. Curtin)、埃尔顿·L. 丹尼尔(Elton L. Daniel)、格拉迪斯·弗兰茨-墨菲(Gladys Frantz-Murphy)、卡伦·L. 朱莉(Karen L. Jolly)、弗兰西斯·卡特纳(Frances Karttunen)、戴维·科普夫(David Kopf)、郭颖颐(Daniel W. Y. Kwok)、威廉·H.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约翰·A. 米尔斯(John A. Mears)、简·纳迪埃(Jan Nattier)、卡拉·瑞恩(Carla Rahn)、威廉·D. 菲利普斯(William D. Phillips)、阿利森·波斯卡(Allyson Poska)、詹姆士·D. 特雷西(James D. Tracy)和赫伯特·F. 齐格勒(Herbert F. Ziegler)。非常感激的是,当我鲁莽地闯入诸多“学术禁地”而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支持时,他们不仅给予支持,还提供了良好的建议。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简妮,她总是使我充满希望。

杰里·H. 本特利

1992年3月于檀香山

目 录

1 中译本序言

1 前言

1 第一章 跨文化联系与交流

22 第二章 丝绸之路早期

55 第三章 传教士、朝圣者和世界宗教的传播

97 第四章 游牧帝国时期

146 第五章 面向新的世界秩序

164 参考文献

179 索引

186 译后记

第一章 跨文化联系与交流

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耶和華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10:1)。跟随她到耶路撒冷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10:2)……希兰的船只从俄斐运了金子来，又从俄斐运了许多檀香木(或作乌木，下同)和宝石来(10:11)。^①

——《新旧约全书·列王记 1》

古代以色列有一位匿名历史学家曾记载了所罗门王室商业活动。他更在乎对耶和華的崇拜，而非贸易网络和政治结盟的演变，但示巴女王亲自从阿拉伯半岛南部前往所罗门王的宫廷拜访并馈赠礼品的事情，让其大为感慨。除此之外，他还详细描述了所罗门建造的奢华神殿。这个神殿装饰着来自俄斐(大致在也门或索马里，也有学者认为在莫桑比克或津巴布韦)的黄金、宝石和珍稀木材。最后，他还提到了所罗门王在亚喀巴湾头以旬迦别建立港口和海军，与腓尼基地区推罗的国王海拉姆(Hiram of Tyre)结盟，控制了埃及到叙利亚之间的马匹和战车贸易等。^②

① 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新旧约全书·旧约》，南京：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81年，第421页。作者引文出自《圣经》(钦定本)版本，该版本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发布诏令，经过英国圣公会近五十名学者编订而成，1611年正式出版。——译注

② 译者按：《新旧约全书·旧约》对此记载：“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有战车一千四百辆，马兵一万二千名，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10:26)……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10:28)。(转下页)

所罗门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影响。为了寻求政治结盟，所罗门与很多王朝都建立了联姻关系，他的妻妾包括埃及法老的女儿和中东各地的女人。为了外交需要和维持和睦的关系，所罗门允许他的妻妾保持原来的信仰，甚至在耶路撒冷为她们建造圣坛和祭台。这位虔诚的历史学家对此大为不满。

耶和华向所罗门愤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11:9)。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11:10)。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11:11)(列王记 1, 11:9—11)^①

现代历史学家和研究《圣经》的学者认为异域文化影响的重要性远胜过所罗门的妻妾。例如，腓尼基建筑师设计和建造的著名神殿，呈现出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腓尼基等多元风格；同时，异域思想还影响了希伯来人对天国和天国中各类天使等次的认识。现存证据表明，在所罗门统治时期，异域文化的影响推动了早期耶路撒冷向多元化、世界性城市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宗教融合。

古代以色列的经历让我们注意到近代之前生活在不同文明状态下各民族彼此联系的历史现象，但是以往的历史学家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公元 1492 年之后，跨文化联系深刻影响了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进程。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近代跨文化交流的动因作出了很多有益的分析，在此就不一一提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认识近代世界历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主要集中于长途贸易、技术传播、帝国和殖民活动、大规模移民、动植物和疾

(接上页)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六百舍客勒，马每匹一百五十舍客勒。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这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10:29)。”详见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新旧约全书·旧约》，第 422 页。

① 同上书，第 422—423 页。——译注

病的长途传播以及跨文化传教活动等研究,并认为这些历史现象 5
是近代世界发生动荡变化的主要原因。

然而,针对近代之前的研究却并非如此。历史学家早已意识到近代之前就存在大量跨文化交流现象,例如著名的穿越欧亚草原的丝绸之路,许多地方的人改宗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公元 13 世纪蒙古统治时期欧亚大陆出现的贸易和游历等。他们还对跨文化联系的某一历史时期和一些重要事件做出了深入研究,本书对此也有所借鉴。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很少对近代之前跨文化联系的方式和影响进行全面分析。^①

即使在远古时期,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游历、移民或者征服,就引起了跨文化交流,有时甚至造成重大影响。由于跨文化的参与群体通常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交流结果有着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期望,所以这种交流就导致大量的冲突。权且不论这些激烈的冲突,跨文化交流作为近代之前世界发生变革的有效动因,促进了技术、思想、信仰、价值观念、宗教和文明的传播,影响了所有参与群体的文化特性,有时候甚至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为人们重新认识或评价这些群体的文化传统提供了可能。总而言之,公元 1500 年之前,跨文化交流在世界文化范式的形成中发挥着至为重要的作用。

一、跨文化交流的方式

本书主要考察近代之前不同文明和文化地区之间各民族的交流,尤其关注文化边界的形成和变迁,并探究文化边界形成的动因

① 其中两位学者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分析的价值。威廉·H.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考察了近代之前和近代之后的技术、疾病的跨文化传播,详见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1963;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1976。菲利浦·D. 科廷(Philip D. Curtin)概述了近代之前和之后的跨文化贸易模式,详见 Philip D. Curtin, *Cross-Cultur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1984。作者从麦克尼尔和科廷的研究中颇受启发。

- 6 等。例如,异域文化元素在何种(政治、社会、经济或文化的)条件下能够跨越文化边界?作为本土和异域文化中介者的个人发挥着何种作用?是什么驱使着人们接受,并推动异域文化的传播?人们是如何发现那些易于理解的术语和概念,并以此来解释和传达异域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近代之前,各个民族如何回应异域文化对他们文化传统的挑战?在什么条件下,文化会发生改宗、冲突和融合?或换句话说,文化障碍消除之后,如何引起了新的文化结构和文化边界的形成?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不易论证。困难之一就是关于概念的问题,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出适合跨文化交流研究的相关术语和范畴,但在涉及“跨文化”、“跨文明”等分析时却需要这些术语和概念。^①因此,有必要对在研究中使用的重要术语和分析范畴进行解释,这包括各种形式的“跨文化改宗”、本土和异域文化传统的融合以及抵制异域文化的挑战等。

- 如果近代之前,跨文化交流就频繁出现(后面将详细论述),那么信仰和价值观念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跨越文化边界,得到其他文明地区民族的认可,从异域文化传统中吸引改宗者呢?“跨文化改宗”是一个比较晦涩的概念。“改宗”会让人联想起强烈的个人情感、灵魂的重新洗礼以及价值观念被颠覆等,好像被释迦牟尼、圣保罗、圣奥古斯丁或穆罕默德进行彻底的宗教洗礼一样。^②早期跨文化交流经常会引起类似的改宗吗?或者,除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外,其他宗教是否也引起了此类精神层面的改宗?

现存关于近代之前的资料,并不能完全展现人们的精神状态,至少不能充分深入到文化传统或宗教改宗者的精神层面,因而不可能将“改宗”作为一个深刻的精神或心理过程予以分析。即便存

① 关于人类学家对跨文化交流 and 影响看法,详见 Melville J. Herskovits, *Acculturation*, Gloucester, 1958。

② Arthur Darby Nock, *Conversion: The Old and the New in Religion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Augustine of Hippo*, Oxford, 1933, pp. 1-16; T. W. Arnold, *The Preaching of Islam*, 2nd ed. London, 1913。

在相关的资料,对改宗经历的分析也不能使现代学者满意。例如,安塞尔莫·托麦达(Anselmo Turmeda)本是马略卡岛的一名圣方济各会修士,于公元1386年改宗伊斯兰教。他在自传中说改宗伊斯兰教是因为《新约》在谈到追随耶稣的“安慰者”(基督教称之为“圣灵”)鼓舞他的教徒之时,预言了穆罕默德的崛起。大部分学者认为托麦达对自己改宗的记载过于简单,还发现他参与了反对国家和教会权威的政治活动,并且出生于一个受到宗教裁判所猜疑的犹太家庭。但是,这些事件并不能完全让我们质疑托麦达改宗的忠诚度,因为他在自传中猛烈抨击基督教,维护伊斯兰教,流露出虔诚的改宗决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从精神或心理过程对他的改宗进行全面而确凿的分析。^①

近代之前,人们经常会彻底接受异域文化传统,并经历深刻的精神或心理转变,但更为普遍的则是出于政治、社会或经济目的而为之。后者对个人心理并无深刻影响,但产生的文化效应却与前者相当,甚至有所超越。当新文化传统进入新的社会、教育和宗教环境时,会影响当地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整个社会发生巨大转变。^② 因此,我用“社会改宗”一词指称近代之前人们接受或适应异域文化传统的过程。本书所指的“改宗”极少针对个人精神或心理的转变经历,主要指整个社会的改宗过程。

与所有大规模的社会进程一样,社会改宗极为复杂,并需要经过长时间才能发挥效应。当然,社会改宗最终取决于人们接受新文化传统的意志,但也不仅于此,也可以先通过建立制度以鼓励人们适应新的文化传统,这些制度可以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努力而发挥作用。下文提到的社会改宗过程通常需要三到五个世纪才会大

① 关于托麦达生平情况,以及托麦达自传的阿拉伯文本和西班牙译本,详见 Miguel de Epalza, *La Tuhfa, Autobiografía y polémica islámica de Abdalḥa al-Taryuman (fray Anselmo Turmeda)*, Rome, 1971。

② 关于单一文明内部长期的文化转变(尽管并未谈及跨文化交流),详见 Norbert Elias, *The History of Manners*, trans. E. Jephcott, New York, 1978; *Power and Civility*, trans. E. Jephcott, New York, 1982。

规模出现。尽管社会改宗的过程非常缓慢,但却影响了世界上大多数民族所传承的文化遗产,所以在近代之前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社会改宗是近代之前世界文化史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过程。

- 9 近代之前,大规模社会改宗的原因很多。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下,改宗异域信仰、价值观念或文化标准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方式。改宗经常在特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下发生,改宗新文化或宗教传统的人不只在精神或文化上受益。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一成不变或单一的理论来解释跨文化改宗的过程,当然也不存在单一的改宗过程。总的来看,近代之前经常出现的大规模社会改宗通常表现为三种形式即自愿改宗、迫于政治、社会或经济压力而发生的改宗和通过同化而发生的改宗。

这三种改宗方式中,自愿改宗最不容易被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放弃长期坚持的宗教或文化传统,选择一个陌生的取而代之呢?在众多的文化选择中,人们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继承的传统,接受一种差异很大的宗教或文化传统呢?总而言之,改宗一种新的宗教或文化传统经常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遵守新的律法和仪式,穿着不同的服装,与家人、朋友建立新的关系,改变饮食习惯,甚至使用不同的语言等。近代之前,究竟是何种前景和契机让这些人自愿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呢?

自愿改宗有助于推动与组织有序的外邦人建立政治、经济或商业联盟。近代之前,自愿改宗的主要发起者是经营长途贸易的商人,他们在贸易地区建立聚集区,沿袭固有的文化传统。^①久而久之,牧师、僧侣和卡迪(伊斯兰教的判官)等文化人士也来到这里。这些聚集区经常成为传播宗教或文化的据点。

那么,本地人为什么自愿接触异域商人的文化传统呢?异域商人经常在不同的文化区域经营贸易,而且当地统治者及其他人人都意识到与其合作能够带来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基于实际的考

^① 关于贸易流散群体,详见 Curtin, *Cross-Culture Trade in World History*。